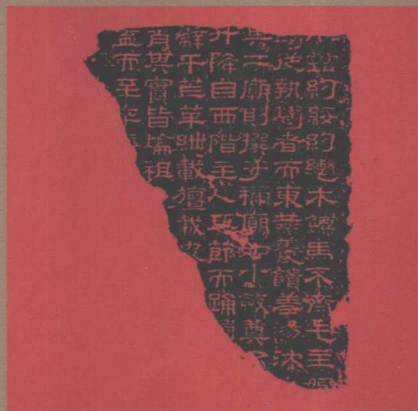


历史文献研究

《北京新九辑》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

LISHI WENXIAN YANJIU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文献研究

(北京新九辑)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文献研究: 北京新九辑/刘乃和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8

ISBN 7-303-04762-X

I. 历… I. 刘… III. 历史-文献-研究-中国-文集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1447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出版人: 谢维和

北京东晓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1.5 字数: 250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100 册 定价: 15 元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邓瑞全 刘乃和 朱仲玉 来可泓
李叔毅 周少川 戴南海

主 编 刘乃和
常务编委 朱仲玉

编委会通讯处：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转
邮政编码：100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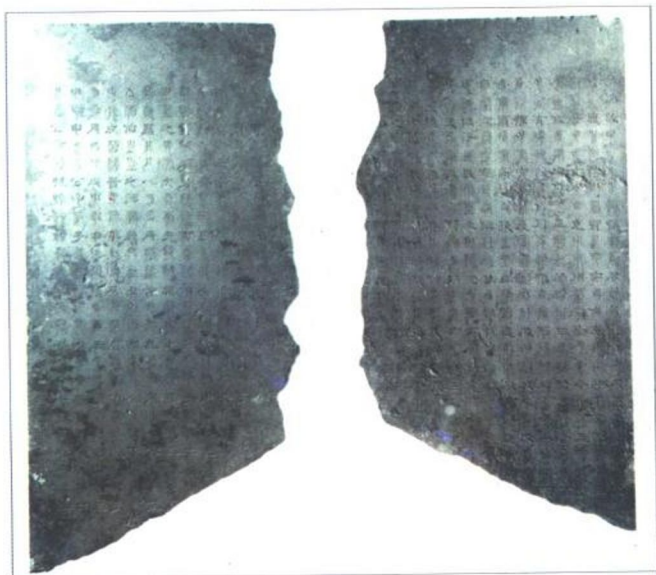
图版一
喜平石经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始刻,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完成,蔡邕用隶书手书上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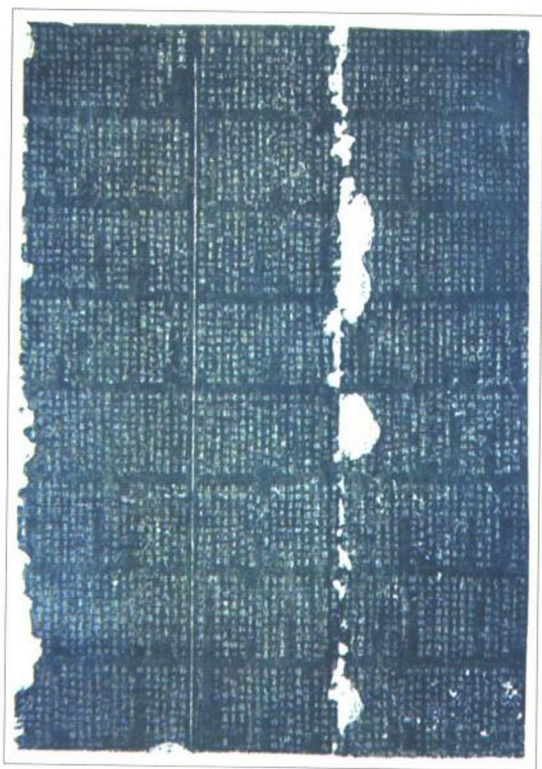
图版二
正始石经

三国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8年)完成,用科斗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书写上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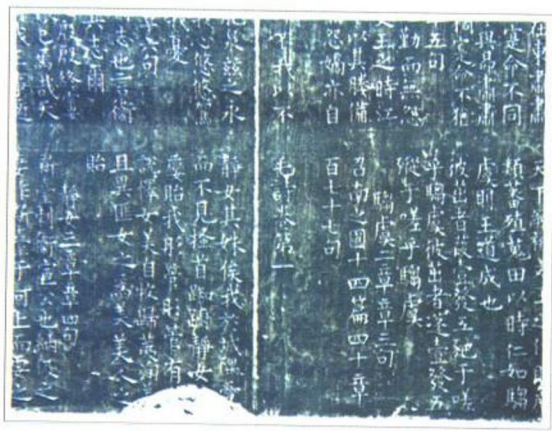
图版三
开成石经

唐文宗大和元年
(公元827年) 郑
覃倡刻, 开成二
年(公元837年)
完成, 用楷体书
写上石。



图版四

开成石经之一
《毛诗》



目 录

石经、校勘与文化传播 (图版说明)	邓瑞全 (1)
-------------------	---------

弘扬励耘精神 开创史学新风

——浅论刘乃和先生的史学成就	周少川 (5)
----------------	---------

孟子的古史观	赵光贤 (23)
--------	----------

宋评封神演义解题	王利器 (27)
----------	----------

清人笔记随录	来新夏 (32)
--------	----------

马衡教授与博物馆事业	傅振伦 (50)
------------	----------

闲堂近岁文录	程千帆 (53)
--------	----------

中国稻作农业起源新探

——兼析稻在先秦人民饮食生活中的地位	姚伟钧 (56)
--------------------	----------

先秦历史编纂学简论	李颖科 (65)
-----------	----------

《山海经》：从神话回归历史	胡远鹏 (日) 竹野忠生 (85)
---------------	-------------------

试论秦始皇汉武帝的文化观	来可泓 (108)
--------------	-----------

汉代统治者的意向与儒、道、释三教的关系

——兼论王莽篡汉与儒家礼治的信仰危机	郭伟川 (114)
--------------------	-----------

司马迁与《周易》	徐兴海 (120)
----------	-----------

《汉书·百官公卿表》探论	徐家骥 (133)
--------------	-----------

略论《神龙兰亭》墨迹本书文并存的真实性

——兼论“兰亭论辨”的起因及教训	刘启林 (143)
------------------	-----------

顾野王《玉篇》及其对《说文》的匡正	顿嵩元 张荣华 (168)
唐诗比较读法例说	陈增杰 (181)
范成大与桂林山水	张家璠 (192)
《容斋随笔》与洪迈求实致用的史学思想	顾志华 万义广 (202)
论马端临《文献通考》与王圻《续文献通考》 ..	钱茂伟 (209)
元代科举与诗	王忠阁 (219)
宋濂与明代史学	朱仲玉 (233)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西学观	黄品良 (249)
跋王国维译稿《伦理学》(1902)	佛 雏 (263)
陈垣与古籍整理	邓瑞全 (272)
《永乐大典》“谥”字残卷的价值	汪受宽 (288)
戴钦简谱	刘汉忠 (295)
从《书林清话》看叶德辉对版本鉴定的认识	贾卫民 (308)
辨证精审的顾氏校勘学	车承瑞 (316)
《文镜秘府论》札记二题	林校生 (329)
说曾巩校书	余敏辉 (338)
对“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再思考	
——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札记	田志勇 (345)
银雀山简本《孙子》残简臆札	刘春生 (352)

石经、校勘与文化传播

邓瑞全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于竹帛，镂于金石”是文化记录和传播的主要方式。晋以前，竹帛是最主要的书写材料，金石则是重要的补充。现存早期的文字记录首推 3500 年前的殷墟甲骨刻辞，其次为铸刻于青铜器之上的铭文，即金文。“金石并称”，石刻出现也非常早，并在后世发扬光大。

在众多的石刻文献中，春秋时期的秦石鼓文最为著名，但就学术和校勘价值而言，印刷术广泛应用之前的“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和“开成石经”更受人们重视。（参见书前图版）

熹平石经始刻于熹平四年（公元 175 年），成于光和六年（公元 183 年），共刻有《书》、《诗》、《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六部儒家经典，（《后汉书》卷 8《孝灵帝纪》记载：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蔡邕传》则为六经。）立于都城洛阳太学门外。《后汉书》卷 60 下《蔡邕传》记载此事甚详：灵帝建宁三年（公元 170）后，“（蔡邕）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晷、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颢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蔡邕奏请将儒家经典上石镌刻，是因为流传于世的经籍在文字上有很多错误，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儒家学说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学术的进步，教育的发展，政

治上的需要，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文本与此相适应，熹平石经可谓应运而生。熹平石经是历史上第一次将儒家经典镌刻上石，其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为校勘提供了标准、规范、权威的文本，广大士人可以据此校勘自己手中的典籍，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第二，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献的复制只能靠抄写，而熹平石经的完成和开放，为许多人同时抄写提供了可能，当时“观视及摹写”的人非常多，每天有一千余辆车前往，交通为之堵塞，其文化传播功能至为显著。蔡邕为著名书法家，熹平石经由他亲自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上石，堪称书法珍品，这是受时人欢迎的又一原因。

正始石经刻于三国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8年），只有《尚书》和《春秋》两部，用古文（科斗文）、篆文和隶书三种字体书写上石，故后世又称三体石经。正始石经的影响远远比不上熹平石经。

北魏杨衒之《洛伽伽蓝记》卷3对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有记载：“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堂，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写《春秋》、《尚书》二部，作篆、科斗、隶三种字，汉右中郎将蔡邕之笔迹也，犹有十八碑，余皆残毁。复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里隶书，写《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又《读书碑》一所，并立堂前，‘魏文帝作《典论》’云。碑至太和十七年犹有四存。……武定四年，大将军迁石经于邺。”杨衒之于武定五年（公元547年）重游洛阳后写作《洛伽伽蓝记》，其中内容多为闻见之事，可信度较高。但杨衒之没有搞清这些残碑中哪些为熹平石经，哪些为正始石经，因此这段记载比较含混。文中所说的“三种字石经”《春秋》、《尚书》，当为魏正始石经，不可能是蔡邕的笔迹。隶书的《周易》、《尚书》、《公羊》、《礼记》等才是蔡邕的笔迹，当是熹平石经。当然，杨衒之写作《洛伽伽蓝记》时，距熹平石经之立已经有370年，距正始石经之立也已经

有 300 年了，许多史迹早已湮没无闻，他的记载应该说还是非常珍贵的。对熹平石经中的《诗》和《仪礼》，文中没有提及，不知是偶然遗漏，还是缺文所致。

熹平石经曾多次搬迁，武定四年（公元 546 年）被迁往邺都，隋初又被迁往长安，唐初竟然被用作建筑材料，损毁严重。本世纪初，罗振玉、马衡等学者曾经大力搜求，收获有几百块，罗振玉编有《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马衡编有《汉石经集存》。不过从历代典籍记载来看，所存不会有这么多，其中肯定有许多赝品。

开成石经刻成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 837 年）。唐文宗大和元年（公元 827 年），郑覃奏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汉故事，立石太学，历经十年才得以完成。开成石经的镌刻，是对儒家经典的一次全面的校勘整理。开成石经刻有十三经中的十二部，有《易》9 卷、《书》13 卷、《诗》20 卷、《周礼》10 卷、《仪礼》17 卷、《礼记》20 卷、《春秋左氏传》30 卷、《公羊传》10 卷、《谷梁传》10 卷、《论语》10 卷、《孝经》1 卷、《尔雅》2 卷。有唐一代，科举考试极盛，此十二经为经学常科考试的基本内容，前九部为正经，后三部为兼经。唐代科举考试不考《孟子》，《孟子》是在北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 1071 年）才被列入考试范围，成为第四部兼经，因此开成石经未予收录。开成石经由郑覃用当时标准的楷体书写上石，至今仍然较好地保存在陕西西安碑林。本世纪初，陶湘曾经代丽忍堂主持复制开成石经，由文楷斋刻字铺用木版摹仿原样雕刻，有朱、墨、蓝三种印本，非常精美。

开成石经在校勘和文化传播方面的价值非常巨大，这从五代时期大规模雕版印刷经籍的历史中可以得出结论。据《旧五代史》卷 43《唐书·明宗纪》记载：长兴三年（公元 932 年），“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又据《旧五代史》卷 126《冯道传》记载：“（唐明宗）时以诸经舛缪，（冯道）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长安）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版，流布

天下，后进赖之。”王溥《五代会要》记载此事尤为详细，其文曰：“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广为抄写，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其它文献如《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也有类似记载。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开成石经是五代雕版刻经的校勘底本，其重要性自不待言。雕版印刷使文献的批量复制和广泛流通成为可能，对于加速文化传播和教育普及，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就儒家经典而言，如果没有开成石经，那么历史上第一批儒经印本将会出现许多文字差异或谬误，传播开来会严重影响学术的发展。

应该说在印刷术推广之前的抄写本时代，由政府主持刊刻的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和开成石经，为儒家经典的校勘提供了较为准确的范本。这些石经刊刻完成后，要立于文化中心的都城，因此又是文献和文化传播的有效方式，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印刷术广泛应用的印本时代到来之后，典籍数量迅速增加，人们得到和阅读书籍的机会比以前要容易得多，石经在校勘和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逐渐变得无足轻重。尽管如此，唐代以后的一些朝代仍然不断地刊刻石经。比较早的五代孟昶蜀石经可不必论，在北宋有“国子监石经”，南宋有“高宗御书石经”，清乾隆年间又有蒋衡书写上石的《十三经》，这些都只有象征意义，没有太多的实际作用，宗教类石经也是这样。

弘扬励耘精神 开创史学新风

——浅论刘乃和先生的史学成就

周少川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刘乃和先生是当今著名的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在五十余年的治学生涯中，刘先生继承励耘主人陈垣先生的学术和治学精神，在陈垣学术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以及史学的普及与提高方面，做出了令人叹服的成就，在有关学科的理论建设上提出许多重要见解，为世人瞩目。在先生 80 寿辰到来之际，我们以浅薄之识，对先生的学术贡献作一些初步的探讨，藉表深深的敬意。同时，也是我们对先生学术的一次再学习。

一、励耘承学：对陈垣学术的研究和弘扬

陈垣先生字援庵，书斋号励耘，是中国近代史学大师。刘乃和先生自 1939 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起，就被陈垣老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所吸引。1943 年先生跟随陈垣老攻读研究生课程，1947 年毕业留任辅大历史系助教并兼陈垣老助手，1955 年任陈老专职秘书，一直到陈垣老校长去世。数十年间，先生追随陈老问学请业，深得陈老学术之精奥，是陈老的“得意学生和助手”，对陈老思想与学行“最为了解”^①。师生为忘年知己，感情笃深，也可称并世无双。因此，总结和研究陈垣的学术和思想，使之弘扬光大，便成为先生跟随陈老以后数十年间孜孜矻矻的研究目标，而以陈垣老在近世的学术地位和重大影响而言，则不难想象先生此项工作

^① 白寿彝：《〈励耘承学录〉序》，《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的重要作用与深远意义了。

先生的陈垣研究着力于几个主要方面。一是注意对陈老著述和行历资料的收集整理。其实，早在先生正式担任陈垣老秘书时，她便以研究陈老学术为己任，随时记录陈老的言行，协助校勘重版陈老的论著。遗憾的是在文革动乱时期，记录陈老论学言谈的笔记中有三大册丢失。幸好仍有一批材料得以留存，而且经先生收集或亲手拍摄，反映陈老自1912年至1971年达60年学术、教学、社会活动的数千张照片则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这是现代社会学术文化界真实写照的宝贵资料。其中的200多张已经由先生编写《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纪念册》出版，这些照片或因年代日久，记忆不清，或因从其它档案文件翻拍，未有时间地点的详细记录，先生发扬陈老的考据精神，利用各种材料参稽互证，从而使每张照片皆有较为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记载。于是，陈老一生各阶段的主要活动与大师风貌跃然纸上，本世纪初以来的文化巨匠，也大多可以在与陈老交往的图片中找到踪迹。因而这样的图册不啻为陈垣研究的重要史料，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文化史册。近期，先生又陆续整理出有关图片1000余张，准备结集出版，以如此众多的图片和文字集中反映一位学术大师半个多世纪的活动，并以视觉材料直接展示近世以来社会文化的一些侧面，这本身就是先生对当代史学的一个新发展。

自四十年代起，先生就开始协助陈老校勘出版有关著述。1944年陈老的《清初僧诤记》付梓，先生便参与了该书一至三校的校对工作。1958年科学出版社重印陈老《史讳举例》，先生遵陈老之嘱将全书引文一一核对，添加引号，注明引文卷数，并改正引文的一些错误。1946年《辅仁学志》刊印陈老《通鉴胡注表微》后半部及1958年科学出版社重印全书，先生都负责了校对的任务，特别是1958年重印时，先生更是协助陈老完成了全书的修订工作，对书中的一些观点和材料，做了必要的改动。1955年至1959

年，陈老重印他的著述丛书《励耘书屋丛刻》，由于该书原为雕版印刷，制作工艺复杂，先生多方奔跑，在数年中重印整书共 50 部，保证了陈老这部大型学术丛书在学术界的流通。陈垣老去世以后，先生根据历年著录，及时地整理出版了《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系年》^①，为学界系统研究陈垣学术提供了基本线索。此外，先生还以新式标点，将陈老的一些著作再次校订出版，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中的《陈垣卷》^②，以及《20 世纪史学名著选》丛书中的《明季滇黔佛教考》^③。后者收入了陈老的“古教四考”、“宗教三书”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 8 部宗教史著作，先生还为这些宗教史论著各写了精当的提要。

第二，先生另一贡献是对陈垣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的规划和推动。陈垣老一生执教，泽被海内，桃李天下。一代宗师谢世时，他的许多门生弟子已卓然成为各个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但是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允许人们公开地研究和宣传陈老的学术，正如启功先生所说：“老师逝世时，是 1971 年，那时还祸害横行，纵有千言万语，谁又敢见诸文字？”^④ 粉碎“四人帮”后，学术界逐步恢复了生气，先生抓紧有利时机，四处拜访陈老往日的学生、同事和朋友，收集各种资料。她把陈垣研究看作整个学术界的大事，在她的联系下，1980 年纪念陈老诞辰 100 周年之际，许多陈老的弟子，那些年近古稀、蜚声海内外的学者纷纷撰文回忆陈老、阐发陈老学术的精蕴，结集出版了《陈垣校长诞辰 100 周年纪念文集》、《陈垣校长诞辰 100 周年纪念论文集》^⑤，以及《励耘书屋问

① 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

②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③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④ 《夫子循循然诱人》，《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

⑤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

学记》^①等文集。1990年纪念陈垣老诞辰110周年，先生又编辑了《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②。以上几部文集共汇集了近百篇研究陈老学术著作、治学方法、教学思想等方面的论文，宏邃深远，各具特色，为陈垣研究奠定了基础。

此外，先生还在学校的支持下，组建了陈垣研究室，制定陈垣研究的长期规划和阶段性任务，向有关部门申报陈垣研究的项目，使这一课题研究沿着明确的目标，有条不紊，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发展。

第三，先生的陈垣研究有深入独到的见解。自陈垣老逝世以后，先生开始发表论文，从各个方面深入研究、系统阐发陈老的学术和思想，仅以先生的两部文集《励耘承学录》^③和《历史文献研究论丛》^④而计，其中收入有关陈垣研究的论文则达25篇之多。先生的陈垣研究覆盖相关问题的各个领域，首先是向世人展示了陈垣老勤奋治学、献身教育，由一位旧民主志士发展成为新中国著名学者和教育家的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她为《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所撰写的《陈垣老师勤奋的一生》^⑤和为《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一卷所撰写的《从事教育工作七十年的老教育家》^⑥，是迄今为止较为详尽的陈老传记。

其二，先生总结陈老在史学上的贡献为宗教史：范围遍及古今中外多种宗教，古教如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另外则如中国的道教，世界性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内容是着重研究宗教的演变和传播史，而不涉及教义教理；在研究方法上则

① 三联书店，1982。

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以下简称《承学录》。

④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以下简称《论丛》。

⑤ 《承学录》，3页。

⑥ 《承学录》，24页。

开创利用经藏资料而考史，通过宗教史研究而及民族史、政治史研究的途径和方法。历史文献学研究：包括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史讳学、史料整理等几个方面^①。元史研究：包括《中西回史日历》的制作，《元典章》的校勘等基础性的工作；元代宗教史与民族史的研究；元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元朝秘史》的研究；《通鉴胡注表微》中的史论等等。^②先生还通过分析陈老具体的史著和史论，探讨了陈老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四个阶段。^③

其三，先生认为陈老的治学有坚韧不拔的刻苦精神，敢下大功夫去作学问，他的第一篇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是在通读 210 卷的《元史》及其它大批材料的基础上做成的；他以五十多岁高龄，每天服用奎宁预防疟疾，在阴暗潮湿、蚊虫众多的藏经室里用一年多时间攻读《嘉兴藏》、《大正藏》和《磧砂藏》，搜寻材料以备佛教史的研究；他不惧往返 3 个多小时的路程，在前后接续 10 年的时间里，披阅和研究了整部文津阁《四库全书》。先生认为陈老治学有勤奋不辍的持久耐力，每天必看书写作，几十年从不间断，直至晚年仍有新作问世。先生认为陈老治学有实事求是、谦虚审慎的态度，立论从材料出发，收集材料“竭泽而渔”，甄别材料去伪存真；每有新作不急于发表，常与师友乃至学生商榷而后定；为文不尚空谈，言简而意赅。^④

其四，先生多次撰文阐述陈老 70 年教育工作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的突出贡献，指出陈老在教育实践中极为重视学生道德品行的培养，并以身作则，树立风范；陈老的文史教学强调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他在大学历史系开创的“史学名著选读”和“史源学实习”课，是分别为扩大学生知识面打好基

① 《承学录》，11～16 页。

② 《论丛》，316～330 页。

③ 《承学录》，17～20 页。

④ 《承学录》，72～84 页。